

近四十年來有關「甲午戰後 清韓關係史」的研究回顧

林亨芬*

有關近代清韓關係的探討，以往論者多將焦點置於甲午戰前的清韓關係與甲午戰爭，相較之下甲午戰後清韓關係史的研究則顯不甚蓬勃。其實，關於此一課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且廣泛的「清韓關係」涉及甚廣，舉凡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皆可納入其中。惟目前筆者蒐羅的資料仍以兩國外交關係的探討為多，依各相關研究課題將其略分為：甲午戰後清國的朝鮮政策的探討、清韓邊界糾紛處理、甲午戰後東北亞的國際關係、兩國的商務往來與文化交流等主題進行剖析。在此藉由梳理近四十年與甲午戰後清韓關係史相關的探討，試圖歸納甲午戰後清韓關係的特點。

關鍵詞：清韓關係、甲午戰爭、國交平行、大韓帝國、東北亞國際關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一、前言

1895 年馬關條約宣告清韓宗藩關係的結束，此後的朝鮮即以追求獨立自主為目標。甲午戰後的清韓兩國由於各自內部的混亂，官方並沒有實際的聯繫。戰後的清廷為了保護在朝鮮的華商、維持雙方的商務關係，以及向朝鮮催還各項債款，遂派遣唐紹儀以「總商董」的身份前往朝鮮處理相關事務。然而，朝鮮方面卻以清韓兩國未簽訂正式商約為由，不願承認唐紹儀的身份。甲午戰後的朝鮮為了維持與清國的關係、表明獨立的事實，韓王高宗在自認脫離日本的控制而避居俄國使館後，¹於 1896 年 7 月向清國表達遣使議約的意圖。此時的清廷雖極不願意承認朝鮮獨立，且在心態上亦不肯與朝鮮進行國交平行的往來，但礙於西洋公法亦無法斷然拒絕。清廷最後乃仿照英國派駐總領事的作法，任命唐紹儀為駐韓總領事，惟仍拒絕互派公使與訂立條約的要求。儘管如此，清國在朝鮮勢力退卻的事實、²列強對於清韓兩國建交的勸說以及韓王於 1897 年稱帝並成立大韓帝國等情勢，均使清廷倍感壓力。清廷面對朝鮮於 1898 年再度提出派使訂約的要求時，在自知無可拒絕以及光緒皇帝批准朝鮮的要求後，清韓兩國的對等外交關係因此得以建立。惟清廷對於出使人員的派遣與國

¹ 朝鮮國王高宗於 1896 年避居俄國使館，此事於韓國史稱「俄館播遷」。

² 如，1896 年年底召開的各國租界會議中，日本領事石井菊次郎說道：「中國與朝鮮無條約，華租界應即充公，歸還朝鮮。」、美使亦云：「華韓無約，華人竟有租界，此誠公法所未見。」見，郭廷以、李毓澍等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 8 卷，第 3389 號，〈總署收駐紮朝鮮總領事唐紹儀稟〉（光緒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頁 4989-4900。

書內容的擬定仍有爭議，致使清國首任駐韓公使徐壽朋遲至 1899 年才抵達漢城呈遞國書，其後雙方於同年 9 月締結《中韓通商條約》。

就近代清韓關係的探討而言，論者多將焦點置於甲午戰前的清韓關係與甲午戰爭，相較之下甲午戰後清韓關係史的研究則不甚蓬勃。除了甲午戰後清國失去對朝鮮問題的發言權外，清國本身所面臨的瓜分危機、清韓關係的曖昧以及史料的侷限，造成此一研究的難題。儘管如此，仍有不少研究涉及此一課題。「清韓關係」內容甚廣，舉凡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皆可納入其中，惟目前蒐羅的資料以兩國外交關係的探討為多。依內容略可分為幾個主題：一、甲午戰後清國的朝鮮政策的探討。二、清韓邊界糾紛處理。三、甲午戰後東北亞的國際關係。四、兩國的商務往來與文化交流，以下分別述之。

二、甲午戰後清國的朝鮮政策之研究

有關甲午戰後清國的朝鮮政策的研究，論者多以唐紹儀在朝鮮的活動與 1898 年兩國建立對等外交關係為主要的探討對象。

（一）唐紹儀在朝鮮的活動及其角色

唐紹儀可謂清國官員中最熟知朝鮮事務者，他從 1882 年 12 月至 1898 年 10 月，先後被派駐朝鮮任職達 16 年之久。唐紹儀於甲午戰前主要擔任袁世凱的副手，至甲午戰後他便成為清國派駐朝鮮的首位官員，直至清國決定派遣首任駐韓公使後他才卸職返國。

1970 年代開始出現討論唐紹儀於甲午戰後在朝鮮活動的論著。李恩涵教授可謂最早論及此一課題的學者，他在〈唐紹儀與

晚清外交〉³一文分別就唐氏的成長背景、任職朝鮮時期的作為以及自朝鮮返國後的任職情形，作詳盡的論述與分析。李氏指出，甲午戰後清國在朝鮮政治上優越的宗主地位，雖為日本所排除，但清廷仍希望保持在朝鮮經濟上的地位，並在國際競爭的局面下，盡其最大的可能以維持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唐紹儀雖力圖阻止朝鮮遣使訂約的要求，但在知悉無法斷然阻止後，他也從中協商雙方派使的事宜。

曾任教於澳洲國立大學的西格爾教授（Louis T. Sigel）則在〈清國外交政策與近代商業社會：唐紹儀在朝鮮〉⁴與〈朝鮮在晚清外交政策中的角色〉⁵兩篇文章中指出唐紹儀認為清朝在面臨朝鮮的遣使訂約要求時應以西洋公法為原則，藉以迴避韓廷的要求。此外，唐氏認為為了維持清朝在朝鮮的勢力，若能運用朝鮮事大派（親清派）的勢力影響朝鮮政局，將使情勢更有利於清朝。

1980 年代以後，則陸續出現討論唐紹儀於甲午戰後在朝鮮活動的文章。如，韓國江原大學教授李求鎔〈唐紹儀在朝鮮的活動及其角色—以清日戰爭前後為中心—〉、⁶韓國中央大學教授權錫

³ 李恩涵，〈唐紹儀與晚清外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 期（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3.5），頁 53-126。

⁴ Louis T. Sigel, "Ching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odern Commercial Community: T'ang Shao-yi in Korea,"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13(March 1976), p. 77-106.

⁵ Louis T. Sigel, "The Role of Korea in Late Qing Foreign Policy."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21(March 1980), p. 75-98.

⁶ 李求鎔，〈朝鮮에서의唐紹儀의活動과그役割—清日戰爭前·後期를中心으로—〉，收入《東洋學論叢：藍史鄭在覺博士古稀紀念》（서울：高麗苑，1984），頁 397-430。

奉〈清日戰爭以後的清韓關係研究(1894-1898)〉、⁷權赫秀〈唐紹儀在近代朝鮮十六年活動考述〉⁸與楊凡逸〈唐紹儀與近代中國的政治外交〉⁹。這些論著皆指出，唐紹儀於甲午戰後以非正式「總商董」的身分赴朝鮮處理商務，但因韓廷不承認他具有官方身分致使唐紹儀無法行使職權，轉而注意收集韓政內情、各國在朝鮮的動向等情報。對於甲午戰後清國之所以不願與朝鮮建立對等外交關係，僅派「總商董」作為保護商民與維持商務的作法，一般認為這是因為清國仍存上國心態而不願視朝鮮為平行之國。對此權赫秀則認為清廷之所以以「總商董」的職銜派遣唐紹儀前往朝鮮，主要是出於清韓兩國間「商章已廢，未訂條約以前，自不便遣官往駐。」的現實因素，所謂清國的宗主觀念應是其次的因素。¹⁰四篇論著在清韓兩國建立對等外交關係的討論上，皆認為唐紹儀對於清廷在處理對韓派使訂約的最終決策上扮演重要角色。

除了上述有關唐紹儀在朝鮮外交舉措的討論外，1990年代以降亦有將視角置於唐紹儀與清韓兩國商貿關係的探討。如，日本學者小原晃在〈日清戰爭後的中朝關係—以總領事的派遣為中心—〉¹¹一文指出，甲午戰爭後的清廷因保護在韓清商的問題，一開

⁷ 權錫奉，〈清日戰爭 이후의 韓清關係研究(1894-1898)〉，收入《清日戰爭을 前後한 韓國의 列強》(서울: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 1984), 頁187-233。

⁸ 權赫秀，〈唐紹儀在近代朝鮮十六年活動考述〉，收入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編，《韓國研究論叢》，21(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9), 頁289-321。

⁹ 楊凡逸，〈唐紹儀與近代中國的政治外交〉(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010)。

¹⁰ 權赫秀，〈唐紹儀在近代朝鮮十六年活動考述〉，頁301。

¹¹ 小原晃，〈日清戰爭後の中朝關係—總領事派遣をめぐる—〉，《史潮》，新37(東京, 1995.9), 頁45-59。

始即未決定在朝鮮設置正式機關，僅以派遣商務常董作為戰前商務委員的延長。因此清廷派遣駐韓總領事的目的是在於保護商民，而非為清韓兩國建立新的外交關係。

由於唐紹儀在朝鮮的經歷，可見其於甲午戰後維繫清韓關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因為如此，多數學者皆認為唐紹儀是 1898 年清韓兩國建立對等外交關係重要的推動者。不過，唐紹儀的報告與他在朝鮮的舉措對清廷而言固然重要，上述文章對於唐紹儀與清廷之間的互動，尤其是 1898 年清廷同意朝鮮遣使訂約的探討上仍有不足之處。以上論著雖然對唐紹儀在朝鮮的活動與處境有深入的分析，可惜忽略大環境的變動因素（如，甲午戰後國際局勢的變遷、清國內部及其政策的變化），致使在了解此一時期的清韓關係仍有不全之憾。

（二）清韓國交平行建立之探討

較早涉及此一研究為韓國江原大學教授李求鎔於 1985 年發表，〈大韓帝國的成立與列強反應—以稱帝建元的議論為中心—〉¹²一文。作者指出，稱帝建元之議最早起於 1894 年 6 月間日本駐朝鮮公使大鳥圭介對韓王高宗的建議。對於韓王的稱帝，除了清國視其稱帝為不當外，列強（日本除外）的反應亦頗為冷淡。不過，1897 年大韓帝國的成立與韓王稱帝建元的事實，也促使清韓關係必須作調整。對清廷而言，大韓帝國一旦獲得列強的承認，清廷勢必會面臨壓力甚至可能引發糾紛。因此探討列強對大韓帝國的態度，不僅可知甲午戰後各國的政策，也是研究清韓關係的重要面向。

¹² 李求鎔，〈大韓帝國的成立과 列強의 反應—稱帝建元 論議를 中心으로 —〉
《江原史學》，1（韓國春川，1985），頁 75-98。

1990 年代以降，出現不少中韓關係史的通論性著作，其中亦有述及甲午戰後清韓關係的部分。如，徐萬民《中韓關係史（近代卷）》¹³一書，除了對甲午戰前的清韓關係有詳盡的描寫外，對於甲午戰時乃至戰後的清韓關係，也有較多的論述。作者指出甲午戰爭時期日韓兩國雖簽訂同盟條約，然而清韓兩國亦有「祕密外交」的存在。作者認為戰時清廷禮遇來朝的朝鮮官員以及清軍與朝鮮人民的合作，皆可視為清韓宗藩關係的延續。甲午戰後清韓宗藩關係的告終，成為兩國建立完全平等關係的契機；清廷經由派遣駐韓商務總董、總領事與公使的三階段，實現清韓關係的正常化。1899 年《中韓通商條約》的簽訂，使雙方關係進入平穩發展期。

王明星《韓國近代外交與中國（1861-1910）》¹⁴一書，從近代韓國的外交舉措切入，探討其變遷與清國的關係。作者認為近代韓國的外交舉措，實質上是掙脫清廷的束縛逐漸走向獨立自主的過程。指出清朝對近代韓國外交的影響有二：第一、清廷對朝鮮的干涉，嚴重損害朝鮮的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阻礙其近代外交發展的步伐。第二、清朝勢力在朝鮮的存在，是維持朝鮮半島局勢的相對平衡，抵制日俄擴張的重要因素。清廷勢力徹底退出朝鮮後，半島局勢立即失控，導致韓國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作者頗具個人觀點，從標題即可見其突破舊說的企圖。惟此書涉及甲午戰爭前後清韓關係的探討不多，主要以朝鮮中立化政策作為核心議題。

¹³ 徐萬民，《中韓關係史（近代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

¹⁴ 王明星，《韓國近代外交與中國（1861-191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王如繪《近代中日關係與朝鮮問題》¹⁵一書，以清日兩國關係為主軸，論述 1870-1909 年清、日、韓三國關係。對於甲午戰後清韓關係的探討與 1898 年清韓遣使訂約一事，僅指出總理衙門是根據唐紹儀的建議，才奏請簡派公使赴韓。白新良等人合著《中朝關係史》¹⁶則與徐萬民，《中韓關係史（近代卷）》內容雷同。值得指出的是，此書認為兩國得以建立新關係的因素在於：兩國有傳統的友好情誼、朝鮮的主動積極促使清朝改變態度、清朝則為保護商業等利益亦有需求。上述因素固然是清韓建立對等關係的因素，卻非導致清廷改變態度的關鍵。朝鮮的主動積極，只不過是促使兩國建立新關係的動因，而非決定性因素。孫昉，〈晚清中國用條約強化中朝宗藩關係的失敗（1876-1895）〉¹⁷則以清廷「立約保藩」的過程為焦點，探討清廷以條約體制強化中朝宗藩體制的失敗原因。指出清廷透過《朝美通商條約》（1882）、《中韓水陸貿易章程》（1882）、《中國代辦朝鮮陸路電線合同》（1885）、中韓《元山電線條約》（1891）等條約的簽訂，以維持清韓宗藩關係，並藉此強化對朝鮮的控制。馬關條約宣告清韓宗藩關係的結束，1899 年《中韓通商條約》的簽訂象徵清國承認朝鮮的獨立。作者指出，從考察清廷「立約保藩」的過程，可見清廷以此作為反駁日本與破壞清韓宗藩關係的回應。

王俊祥〈論甲午戰後中朝關係演變（1895-1900）〉¹⁸一文指

¹⁵ 王如繪，《近代中日關係與朝鮮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¹⁶ 白新良主編、王薇等著，《中朝關係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¹⁷ 孫昉，〈晚清中國用條約強化中朝宗藩關係的失敗（1876-1895）〉，《煙台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8：4（山東，2005.10），頁 461-466。

¹⁸ 王俊祥，〈論甲午戰後中朝關係演變（1895-1900）〉（吉林：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

出，甲午戰後由於各自的窘境，兩國的新關係沒能建立起來。1896 年韓王的遣使訂約要求雖受到清廷拒絕，但訂立兩國商約已成為客觀事實。清廷至 1898 年同意派公使，首任駐韓公使徐壽朋於 1899 年抵達漢城呈遞國書，同年 9 月簽訂《中韓通商條約》，建立兩國對等的外交關係。文中採用的史料以中文為主，對於韓國史料的運用明顯不足。在描繪甲午戰後的清韓關係上，僅將重要史實指出並未多加分析。

楊軍、王秋彬合著《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論》¹⁹一書，討論兩國自古至今的關係變化與內涵。在宗藩朝貢關係的探討上，作者認為宗藩朝貢體系雖然遲至 11 世紀才發展成熟，但是其理論卻是由來已久：包含五土觀、九州觀、四海觀、華夷觀。書中指出，在宗藩體系下的中國與朝鮮半島的關係有以下特點：一、中國開始承認朝鮮半島上的國家是外國，二、中國與李氏朝鮮確立了具有東亞特色的國家交往的特殊模式，三、經濟越來越成為中國與朝鮮半島間互動的主要方面，四、朝鮮始終對中國保有較強的向心力，五、中國與王氏高麗、李氏朝鮮基本上保持和平友好的關係。作者認為清韓宗藩體系的瓦解，標誌著兩國關係開始步入近代條約體系時期，也意味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的終結。1896 年清廷派唐紹儀為駐韓總領事、1898 年任徐壽朋為駐韓公使、1899 年《中韓通商條約》的簽訂，開啟清韓兩國平等外交關係的建立。其後，雙方因邊界問題互有爭論，先是於 1904 年締結《中韓邊界善後章程》，又在日本的介入下於 1909 年簽訂《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1910 年日本併吞朝鮮後，朝鮮與中國的事務皆由日

¹⁹ 楊軍、王秋彬著，《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本代為交涉。朝鮮亡國後，許多愛國人士紛紛亡命中國展開反日獨立運動。最後作者以現今朝鮮已獲得主宰自己命運的機會，期望中韓兩國在相互尊重主權與睦鄰友好的原則基礎上開拓新時代。

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關係嬗變研究》²⁰一書欲透過清朝與朝鮮宗藩關係的研究，更加理解與透視中國宗藩關係的全貌。作者認為，清朝與朝鮮的宗藩關係歷經五個重要的變化階段，²¹以馬關條約標誌兩國宗藩關係的結束。本書雖以清朝與朝鮮的宗藩關係為考察重點，仍在全書之末對於甲午戰後的清韓關係做簡單的論述。作者指出，促成 1898 年清韓兩國互派公使有幾個因素：第一，美國與日本對於中國在朝鮮租界的異議。第二，朝鮮方面對於雙方建立對等外交關係的迫切。清朝最後鑑於國際形勢與清韓兩國共同利益的需要，總理衙門的態度開始有所改變。1898 年清朝首任駐韓公使徐壽朋的出使與致韓國國書的擬定，意味兩國進入平等交往的時期。1899 年雙方簽訂《中韓通商條約》15 款，後因義和團與八國聯軍攻佔北京，使得朝鮮未能完成向清朝遣使的計畫。直到 1902 年初，韓國派遣朴齊純為首任駐華公使，兩國終於實現互派使節的夙願。

關於清韓兩國建立對等外交關係的探討，在西元 2000 年以後出現新的解釋論點。茅海建〈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對外觀念的調

²⁰ 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關係嬗變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7）。

²¹ 第一，從清初到康熙末年，以《南漢山城規則》為標誌。第二，從雍正至同治末年，以朝鮮設立安奉閣為標誌。第三，光緒八至十一年（1882-1885 年），以《中朝商民水路貿易章程》的制訂為標誌。第四，光緒十一至二十年（1885-1894），以袁世凱擔任「駐朝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為標誌，清朝與朝鮮的宗藩關係走向畸變。第五，光緒二十至二十一年（1894-1895），以《馬關條約》為標誌，清朝與朝鮮的宗藩關係至此徹底瓦解。

適)²²與金東建〈戊戌變法時期清國對韓修交決定過程—以光緒帝與總理衙門的朝鮮政策為中心〉²³對於清韓兩國建立對等外交關係的關鍵與過程皆有詳盡的論述。兩篇文章均指出，清國對韓政策轉變的關鍵因素是光緒皇帝。茅海建以光緒帝對於覲見禮儀的改革、為德皇製作星寶、購置世界地圖、親擬致日本國書、召見伊藤博文與赴韓使節的派遣，說明皇帝個人觀念與政策的調適。作者認為從這些細小的事件，可見光緒帝力圖擺脫傳統外交（天朝觀念下的華夷秩序）的束縛。但是茅氏也指出，從清國對於出使人員的派遣與國書擬定的爭議，可見光緒帝與清國官員對於近代外交尚未具備完全的認識。首任駐韓公使徐壽朋個人的外交觀念，更顯現清韓兩國從屬邦到友邦的心態變化。金東建則更一進步針對光緒帝與總理衙門的政策做分析，他引用《國聞報》來說明清廷政策的轉變。他認為 1898 年清韓兩國建立對等外交關係，形成了大清帝國、大韓帝國與大日本帝國並立的狀態，可謂今日東亞國際社會的原型。

蔡建《晚清與大韓帝國的外交關係（1897-1910）》²⁴可稱是中文學界第一個以「大韓帝國」作為探討對象的論著。他指出清韓對等外交關係的建立，主要是透過派遣商務總董、總領事、公使三階段而形成，並認為商務總董的派遣只能算是民間關係的建立，派遣駐韓總領事才算是正式官方關係的成立。作者認為 1899

²² 茅海建，〈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對外觀念的調適〉，《戊戌變法史事考》（北京：三聯書局，2005），頁 413-462。

²³ 金東建，〈戊戌變法期における清國の対韓修交決定過程—朝鮮政策をめぐる光緒帝と総理衙門〉，《年報地域文化研究》，11（2008.3），頁 66-89。

²⁴ 蔡建，《晚清與大韓帝國的外交關係（1897-1910）》（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

年《中韓通商條約》的成立，象徵了清韓兩國平等外交關係的正式確立。其後，清韓兩國針對邊界糾紛，簽訂《中韓邊界善後章程》與《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在日本於 1910 年併吞韓國後，1899 年簽訂的中韓通商條約即被廢除，清韓兩國形式上的關係已不復存在。韓國亡國後，很多反日活動紛紛轉到國外，中國即成為這些抗日活動的大本營。

日本京都府立大學教授岡本隆司在〈韓國的獨立與清國的外交—獨立與自主之間—〉²⁵一文指出，1895 年馬關條約雖載明「清國承認朝鮮獨立」，然而朝鮮獨立實則經歷 1897 年大韓帝國的成立、1899 年締結《中韓通商條約》後才得以實現。作者指出，甲午戰後清國面對大韓帝國的成立與朝鮮派使訂約要求，是以「公法」、「西例」作為基準。韓國於 1899 年達到名實上的獨立，實為國際因素（均勢）所造成。然而此一建築於均勢基礎的獨立自主，終因此均勢的崩裂而告終。文中雖對甲午戰後清韓兩國建立對等外交關係未有詳細說明，但在探討清國政策與韓國追求獨立的背景上給予重要的參考。

韓國暎園大學教授李銀子（Lee Eun Ja）〈甲午戰後的中國在朝鮮的外交使團：總領事唐紹儀與公使徐壽朋〉²⁶以外交使團的組織建立為分析重點，指出唐紹儀於甲午戰後被派往朝鮮處理保護華民的事宜，韓廷因唐氏不具正式官方身份而不予承認，致使唐

²⁵ 岡本隆司，〈韓國の独立と清國の外交—独立と自主のあいだ—〉，收入岡本隆司、川島真編，《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161-180。

²⁶ Lee Eun Ja（李銀子），“Chinese Diplomatic Mission in Korea in the Post-Sino-Japanese War Period: The Terms of Consul General Tang Shaoyi and Legate Xu Shoupeng,”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6:1 (June, 2009), p. 37-80.

紹儀只得透過英國駐朝鮮總領事進行交涉。及至 1898 年清韓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首任駐韓公使徐壽朋就任後，清國在朝鮮的外交組織就此得以建立起來。

從上述探討甲午戰後清韓兩國建立對等外交關係相關論著的回顧，可見研究趨勢上的變化，即是從著重唐紹儀的角色到側重分析清廷內部的決策。此一研究趨勢的變化主要以西元 2000 年做為劃分的界限，2000 年以前的相關研究多屬通論性著作，對於甲午戰後清韓關係的討論僅是描述性文字且未有深入的探討。西元 2000 年以後，除了呈現多元面向的探討外，在論點則更趨成熟並出現新的解釋觀點。

三、清韓邊務糾紛處理

有關清韓兩國的邊務糾紛，主要涉及兩方面：一是「間島」領有權問題，即是越境朝鮮人墾居圖們江以北領土的歸屬問題。二是由此引發的清韓疆界劃分問題。清韓邊務糾紛由來已久，1627 年，後金與朝鮮簽訂《江都會盟》，從此兩國嚴禁邊民到疆界一帶採參捕珠，圖們江流域便形成無人居住的空白地帶。相關探討如：孫春日〈清末中朝日「間島問題」交涉之原委〉²⁷一文指出，清韓兩國於 1712 年勘立定界碑、1882 年簽訂《中國朝鮮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確立圖們江、鴨綠江為疆界之事實。1885-1887 年清韓兩國曾就「間島問題」進行談判，但由於雙方在圖們江正源的認識上大相徑庭，因此未達成共識。此後清韓兩國更加重視這一地區，雙方開始加強對此地的控制。清廷為使圖們江以

²⁷ 孫春日，〈清末中朝日「間島問題」交涉之原委〉，《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2：4（北京，2002.12），頁 48-58。

北的朝鮮墾民服從，實行「薙髮易服」的編籍政策。韓國則在 1899 年派官員進行清韓國界問題的調查，並於 1901 年設立邊界警務署與分署並派駐鎮衛軍，試圖以軍事力量來加強對間島朝鮮人的管轄和保護。1905 年以後，由於日本介入「間島朝鮮人問題」，致使情形更加複雜。日本除了向清政府提出照會，抗議清政府把間島視為自己的領土外，還非法越江掛出「朝鮮統監府間島派出所」的牌子。1908 年 12 月清日兩國再次進行談判，於 1909 年 9 月 4 日訂約，「間島」糾紛至此獲得解決。

蔡建《晚清與大韓帝國的外交關係（1897-1910）》一書，亦針對清韓邊界糾紛進行探討。除了追溯清韓邊界糾紛原由外，對於 1904 年《中韓邊界善後章程》與 1909 年《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的簽訂有詳細的描繪。書中指出，《中韓邊界善後章程》只是維持兩國邊界的現狀，並未解決兩國的邊界問題。儘管事後清韓兩國皆有勘界的共識，然因日本於日俄戰爭爆發後控制朝鮮政局，日本的介入使問題更形複雜。清日兩國經過多次的爭論與談判，於 1909 年簽訂《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與《東三省交涉五案條款》，經韓國政府的照准後，確立圖們江為清韓界河。

韓香蘭在〈論清代中朝邊務糾紛與「間島案」問題〉²⁸一文指出，「間島朝鮮人問題」是解決清韓兩國邊務糾紛的關鍵所在。如果「間島問題」中的越境朝鮮墾民的法律地位及其行政管轄權問題得到確定，有關邊界問題的爭議也就迎刃而解。但在日本的介入下，清日兩國始對於「間島案」進行談判。雙方主要圍繞間島領土歸屬的問題，進行了「照會往復」等一系列針鋒相對的爭

²⁸ 韓香蘭，〈論清代中朝邊務糾紛與「間島案」問題〉，《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9：1（河南，2010.2），頁 114-118。

論。清廷明確表示清韓邊界向以圖們江為天然界限，本無「間島」之名目。日本則主張「間島歸屬未定論」，要求清日兩國先行預議，求得一致的意見作為勘界基礎。其後雙方互有爭執，間島問題於 1909 年才正式獲得解決。作者認為，清政府雖因「間島問題」而喪失部分重要權益，但在主權問題上卻有重大突破，即是維護了「間島」主權與爭取到對間島朝鮮人的管轄權。

四、甲午戰後東北亞國際關係

探討近代清韓關係固然應以兩國為主體，然而當時的國際情勢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尤其，19 世紀下半葉清韓兩國皆捲入列強的東亞爭奪戰中，至甲午戰後列強的爭奪日益激烈。再者，列強對於清韓建立對等關係的介入，可謂促成清韓兩國建立對等外交關係的一大關鍵。因此考察甲午戰後東北亞的國際關係，對於瞭解甲午戰後的清韓關係與清韓兩國的國際地位甚為重要。

有關東北亞國際關係的研究，馬士（Hosea Ballou Morse）、宓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合著的《遠東國際關係史》²⁹堪稱經典之作。此書於 1928 年在上海出版，1931 年修訂後則在波士頓與紐約出版。作者馬士與宓亨利都是西方著名的中國通，都有在中國工作、生活的經歷。全書三十章，前三章主要介紹遠東的地理、19 世紀以前東西方的關係，其餘依次敘述 19 世紀中期到 20 世紀 30 年代初期西方列強與遠東各國的關係。除了論及兩次英法聯軍、太平天國、清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日俄

²⁹ 馬士（Hosea Ballou Morse）、宓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著，姚曾廩等譯，《遠東國際關係史》（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戰爭、辛亥革命、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等重大事件外，對於外交與內政的關係也有深入的分析。有關甲午戰後的東北亞國際關係的論述，書中除了提及日俄在滿洲和朝鮮的擴張、英日同盟與日俄戰爭的爆發外，對於甲午戰後朝鮮局勢則有詳盡的描繪。作者認為，1896 年《韋貝·小村協定》和《羅拔諾夫·山縣有朋協定》實質上都是 1885 年清日天津條約的翻版。雖然看似維護朝鮮的獨立，事實上卻都否定了朝鮮的獨立。俄國在朝鮮的擴張，除了引發與日本的衝突外，英美等國對此亦深感不安。事實上，甲午戰後日俄兩國在東北亞的對立與妥協，仍須顧及英美的態度。1902 年英日同盟的成立，不僅加深日俄間的猜忌與衝突，更因此導致日俄戰爭的爆發並連帶影響朝鮮的命運。

1952 年美國學者巴蒂斯蒂尼 (Lawrence H. Battistini) 發表〈19 世紀的朝鮮問題〉³⁰一文，以 19 世紀的朝鮮為中心，論述各列強勢力進入朝鮮後的情形。文中針對美國在甲午戰爭期間的態度、三國干涉還遼以及戰後日俄兩國在朝鮮的競逐關係進行論述，並指出甲午戰後的俄國趁清朝勢力退出朝鮮之際，藉著聯合朝鮮對抗日本達到在朝鮮勢力的擴張的企圖。作者認為俄國勢力進入朝鮮後，並未替朝鮮帶來好處反而加速其腐敗。此外，俄國透過 1896-1898 年一連串的日俄的外交協定，終使日本承認維持朝鮮的政治現狀。

1960 年代出版了幾本研究 19 世紀下半葉朝鮮局勢的專書，美國學者萊慎 (George Alexander Lensen) 《介於俄日間的朝鮮與滿洲，1895-1904》³¹一書主要以英國駐日外交官薩道義 (Sir Ernest

³⁰ Lawrence H. Battistini, "The Korean Proble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onumenta Nipponica*, 8: 1/2 (1952), p. 47-66.

³¹ George Alexander Lensen, *Korea and Manchuria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1895-*

Satow, 1843-1929) 為中心，運用已出版及未出版的文件論述 1895-1904 年清、日、俄關係以及日俄在滿洲、朝鮮的競爭。以 1900 年劃分為兩部份，首先探討 1895-1900 年滿洲與朝鮮問題，1900-1904 年焦點放在俄國對滿洲的深入及日俄的交鋒。作者認為薩道義具有卓越的洞察力，不僅警覺到俄國對朝鮮、滿洲及中國的意圖，也意識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脅。金流真、金韓喬 (C. I. Eugene Kim and Han-Kyo Kim) 《朝鮮與帝國主義政治，1876-1910》³²一書指出，朝鮮之所以無法獨立自主雖與國際局勢有很大關係，但是朝鮮本身的專制、國王的衰弱及其內部的紛爭也是主因，並對 1905-1910 年日本對朝鮮的逐步控制進行批判。此書主要的貢獻在於，將朝鮮內部情勢與國際局勢相互連結對照，並仔細地論述 1905-1910 年日本對朝鮮的政策。此書雖多方面探討朝鮮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及其未能獨立自主的因素；不過就其資料的運用上而言，帕勒斯 (James B. Palais) 指出此書在掌握韓文方面的二手研究上顯然不足。³³

1980 年代的相關研究，如權武秀 (Moo-Soo Kwon) 《英國對朝鮮政策，1882-1910》³⁴一書，作者分析英國對朝鮮的政策是採其一貫「均勢」(balance of power) 原則，英國遠東政策則依其在歐洲地位與世界利益來決定。然而甲午戰後的三國干涉還遼，

1904 (Tokyo: Sophia University, 1966).

³² C. I. Eugene Kim and Han-Kyo Kim, *Korea and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 1876-19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³³ James B. Palais, "Reviewed Work(s): *Korea and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 1876-1910*. by C. I. Eugene Kim; Kim Han-kyo,"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8:4, (Aug., 1969), p. 863.

³⁴ Moo-Soo Kwon, "British Policy Towards Korea, 1882-1910." (Boston Spa, Wetherby, West Yorkshire, U.K. : British Library Document Supply Centre, 1982)

使英國轉向尋求同盟的路徑。英日同盟的成立，成為日本擴張的有力後盾，最終使其併吞朝鮮。宋禎煥《沙俄侵略朝鮮簡史》³⁵一書，雖以馬列主義的歷史觀分析，卻本著歷史研究的精神勾勒出俄國侵略朝鮮的歷史。俄國對朝鮮的侵略相較其他地方有其特點，即是以「溫和」、「漸進」的方式。作者認為，正因為俄國對朝鮮侵略方式的不同，使人們很少或是忽略了俄國對朝鮮的侵略。此書從最初的韓俄關係談起，以 1910 年日本併吞朝鮮作為最後結束；雖然簡略，卻大致勾畫出韓俄關係的發展大勢。

萊慎（George Alexander Lensen）《伐謀篇：列國在朝鮮及滿洲的對抗，1884-1899》，³⁶依時間序列闡釋俄國的遠東政策。作者本身懂多國語言，引用的書類甚為廣博，除了英文、日文、俄文、韓文的外交檔案外，兼合法國、德國、比利時等國的外交檔案。據張存武教授的書評言：「作者雖曾到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檔案室，然而書中未徵引中國檔案。其中原因雖不明，然卻屬美中不足之一。」³⁷在結論中作者認為過去由於誇示了俄國的強大，歪曲了俄國的外交政策；其原因在於大部分研究者不懂俄文。作者以俄國檔案出發，企圖將沙俄時代的遠東政策還以原貌，用力最深在於俄國遠東政策及其對朝鮮政策的性質。本書闡釋俄國遠東政策與多數論著論點不同；一方面點出俄國在內部分歧下外交的弱點，另一方面則認為俄國的外交政策是被動地因應

³⁵ 宋禎煥著、張璉瑰譯，《沙俄侵略朝鮮簡史》（臺北：中華民國韓國史研究學會，1993），頁 2。

³⁶ George Alexander Lensen, *Balance of Intrigue: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Korea and Manchuria, 1884-1899* (Tallahassee: University Presses of Florida, 1982).

³⁷ 張存武，〈評 George Alexander Lensen 著 *Balance of Intrigue: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Korea and Manchuria, 1884-1899*〉，《漢學研究》，1：1（臺北，1983.6），頁 327。

局勢的變化。

楊昭全《日帝霸占朝鮮始末（1876-1910）》³⁸則從日本的對外擴張談起，指出其侵略性質及在不同時期侵略朝鮮得到不同帝國主義者的慫恿與支持。將日本從侵略至吞併朝鮮的期間分幾個階段：1876年《江華條約》打開朝鮮門戶、1894-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1904-05日俄戰爭、1907年高宗退位至1910年日韓合併。對於甲午戰後日俄在朝鮮的抗衡，作者點出俄國積極拉攏扶植以高宗、閔妃為首的親俄勢力與親日的政府內閣形成對立。1896年韓王高宗避居俄館後，日俄陷入相互抗衡的階段。後因《英日同盟》的成立使日本有了與俄國對抗的籌碼，遂導致1904年的日俄戰爭。對於日俄戰後日本對於朝鮮的侵略與逐步併吞，本書有詳盡說明並對此時期朝鮮內部的反動情形有大致的描繪。本書與《沙俄侵略朝鮮簡史》各將日俄在19世紀下半葉對朝鮮的侵略作一簡明的說明，使讀者清楚的了解此一過程。除了篇幅略顯不足外，亦受限於時代的意識形態，致使在論述時仍可見馬列思想穿插其中。不過這兩本書仍具其意義，可謂此一問題較早出現的中文論著。

1990年代以降，除了通論性的著作外，也有不少甲午戰後東北亞國際關係的研究論文。通論性的著作如，黃定天著《東北亞國際關係史》³⁹一書論述了19中葉至20世紀中葉東北亞國際關係的大勢。作者指出，俄國透過兩次英法聯軍取得廣大的東方土地，日本則在明治維新後高唱征韓論，並積極干涉朝鮮事務。甲午戰爭與三國干涉還遼改變了東北亞國際關係的樣貌，在此之前

³⁸ 楊昭全，《日帝霸占朝鮮始末（1879-1910）》（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³⁹ 黃定天，《東北亞國際關係史》（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

的東北亞國際關係多為雙邊交涉，由朝鮮問題而起的甲午戰爭使雙邊關係轉為多邊關係。列強間的相互制衡與協調，使東北亞局勢更加複雜。日本的崛起更改變了東西方關係的結構，連帶也改變東北亞地區的結構。

相關論文如，權赫秀在〈日俄戰爭對近代中韓關係的影響〉⁴⁰一文提及，隨著日俄戰爭結束 100 周年的到來，除了日本與俄國之外，韓國等相關國家的學界都在重新關注和審視這場 20 世紀初的東北亞大戰。近來國際學界對於日俄戰爭的研究，也逐漸形成不能沒有中國與韓國視角的共識。作者指出，清韓兩國在日俄戰爭中雖然都宣布「戰時局外中立」，然因兩國皆無法充分履行中立國的義務，也沒有得到交戰國與其他國家對其中立地位的承認與尊重，致使兩國領土遭受戰火的洗劫，而清韓兩國即成為這場戰爭中直接遭受侵略的一對「中立國家」。事實上，「局外中立」並未成為清韓兩國雙邊關係中的一個主要議題，清國駐韓公使館也沒有成為清廷獲取有關戰況及相關情報的主要來源。從清韓兩國的往來文書中可見，邊界問題才是當時兩國關係的重要癥結。清韓邊界與漁業紛爭由來已久，清廷曾於 1904 年向韓國提出會勘、商定之議，惟因當時韓國已受制於日本、喪失了外交決定權。1904 年清韓簽訂《會議中韓邊界善後章程》12 條，是清韓兩國在日俄戰爭期間所簽訂的惟一一份雙邊關係文件，也是近代以來清韓兩國就邊界問題達成的第一份正式協議。日俄戰爭無疑對清韓兩國造成重大的影響，除了同樣遭受戰火的波及外，兩國的外交關係、邊界爭議、漁業紛爭的處理皆因此戰爭而受挫。作者

⁴⁰ 權赫秀，〈日俄戰爭對近代中韓關係的影響〉，《近代史研究》，2005：6（北京，2005），頁 109-133。

最後指出，日俄戰後日本不僅成為韓國的主導者，更連帶地阻礙了清韓兩國正常外交關係的往來，致使兩國之間公使級的外交關係不滿 10 年而夭折。

福田忠之〈對 1896 年《山縣－羅拔諾夫協定》的若干考察〉⁴¹一文，試圖透過《山縣－羅拔諾夫協定》的簽訂過程，探討山縣有朋使團在莫斯科的外交活動。除了將重點置於甲午戰後日俄兩國對韓政策的探討外，對於山縣有朋出使俄國的背景也有詳盡的描繪。日本希望藉此與俄國就朝鮮問題進一步達成協議，惟對俄國而言拉攏清國為其戰略方針的另一考量。早在山縣有朋抵達俄國之前，李鴻章與俄國外相羅拔諾夫（A. B. Lobanov-Rostovskii）即開始針對雙方訂立密約之事進行交涉。清俄密約的訂立，可謂限制日俄的協商。作者指出，日本對於《山縣－羅拔諾夫協定》的評價很低，甚至認為此協定是日本對俄外交的一大失策。

苑爽〈試析甲午戰爭與東亞宗藩體系的解體〉⁴²一文，指出在日本對朝鮮的野心下，清廷欲透過與朝鮮訂立條款已重申兩國宗藩關係，並進一步加強對朝鮮政治、軍事、外交的操縱。甲午戰爭導致東亞國際格局發生了明顯變化：清國的衰落與聯俄制日、日俄爭霸、英日同盟與美國勢力的興起。因為清國在甲午戰爭的失敗，使它失去對朝鮮宗主國的地位，使朝鮮受到日本的宰制最後更淪為日本的殖民地。王明星，〈英日同盟與近代朝鮮的歷史

⁴¹ 福田忠之，〈對 1896 年《山縣－羅拔諾夫協定》的若干考察〉，收入北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編，《日本學》，13（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頁 124-140。

⁴² 苑爽，〈試析甲午戰爭與東亞宗藩體系的解體〉，《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3：6（河南，2006.11），頁 133-136。

命運)⁴³，指出英日同盟是近代東亞乃至全球國際關係史上一個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件，它標誌著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國主義兩大軍事集團在東亞的形成。文中除了考察英日同盟締結的抗俄背景外，並提及英國之所以選擇與日本同盟實因於英俄妥協與英德協約的失敗。英日同盟激化俄國對外政策的強硬，導致日俄戰爭的爆發。而英日同盟的成立，更成為日本侵略朝鮮的有力後盾。

崔文衡《圍繞著韓國的列強角逐－19 世紀末的國際關係》⁴⁴一書，以英俄對立作為貫穿全書的主軸，指出 1880 年代初期韓英、韓俄締約開啟英俄在朝鮮半島的對決，使韓國捲入英俄對立及清日對立的二重對立結構中。作者認為就當時日本在朝鮮半島的擴張而言，有三個牽制因素：英國、俄國與清國。日本巧妙地利用英俄對立，以去除英、俄、清三國對於它在朝鮮擴張的干涉。甲午戰後日本開始加緊對朝鮮的控制，卻因俄國的介入與韓王高宗避居俄國受挫。為此日本與俄國進行妥協，日俄兩國於 1896 年簽訂《韋貝·小村覺書》與《羅拔諾夫·山縣議定書》，確立俄國主導朝鮮事務的基礎。然而至 1898 年，俄國卻主動向日本表示協商朝鮮問題。作者認為此事乃俄國鑒於英日同盟成立的可能，為其自國安全才毫不猶豫的對日讓步。1898 年《羅森·西協商》的締結，象徵日俄在朝鮮對立的終結，此時亦形成英、美、日共同牽制俄國的情勢。作者認為馬關條約第一條所指稱的是清國認定韓國為完全獨立國，而非日本。換言之，日本於此條約中並未認定韓國獨立，為其日後在朝鮮半島留有處置權。

⁴³ 王明星，〈英日同盟與近代朝鮮的歷史命運〉，《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4（山東，2007.10），頁 108-112。

⁴⁴ 崔文衡著、齊藤勇夫訳，《韓国をめぐる列強の角逐－19 世紀末の國際關係》（東京：彩流社，2008）。

五、兩國的商務關係與文化交流

除了上述偏重探討清韓兩國外交關係與甲午戰後東北亞國際關係的研究外，清韓兩國的商務關係與文化交流也是瞭解清韓關係史的重要面向。有關兩國商務關係的研究，如美國學者拉森（Kirk W. Larsen）《傳統、條約與貿易：清朝帝國主義與朝鮮（1850-1910）》⁴⁵一書，論述 19 世紀下半葉清國對朝鮮的政策。作者指出，1882 年《韓美條約》的簽訂是清廷積極介入朝鮮內政的開端。全書的核心探討 1882-1894 年袁世凱在朝鮮的舉措，指出清廷官員如何致力於擴大中國商人在朝鮮的貿易進而使中國商人在朝鮮的國際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此一情形即便至甲午戰後仍未改變，惟至 1905 年以後因日本欲壟斷在朝鮮的特殊利益並企圖將朝鮮納為殖民地，致使中國商人在朝鮮的行動受限。本書在探討甲午戰後的清韓關係時，將重點置於唐紹儀與其他清朝官員對於維持清朝在朝鮮的優勢與保護中國商人所作的努力，惟對 1898 年清韓建立對等關係的論述上稍嫌不足。

此外，李廷江〈日本財界的朝鮮政策—以「日韓通商協會」與「朝鮮協會」為中心—〉⁴⁶論述了 1894 年以後日本財界對朝鮮的關注。指出 1894 年成立的「日韓通商協會」以實現日本財界的「大陸雄飛」、促進日韓關係、打破清國的發展為主要目標。部份財界人士為促進日本對朝鮮的經濟侵略，於 1902 年 3 月成立「朝鮮協會」。事實上兩者的目標相近，以經濟為主、透過研究

⁴⁵ Kirk W. Larsen, *Tradition, Treaties, and Trade: Qing Imperialism and Choson Korea, 1850-191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⁴⁶ 李廷江，〈日本財界の朝鮮政策—『日韓通商協會』と『朝鮮協會』を中心に—〉，頁 67。

調查、發行會報（月刊）、商品陳列所，並成立日本、朝鮮各地支部，惟「朝鮮協會」政府色彩較濃厚。透過上述活動，日本逐漸破壞清國與朝鮮的經濟關係，踏出日本霸權的第一步。

在兩國文化交流的探討上，可參考薛平，〈張謇與金滄江——一個世紀前的中朝（韓）友誼個案研究〉。⁴⁷張謇是清廷官員，金滄江則是朝鮮著名愛國運動者與詩人。兩人的結識於 1882 年張謇到朝鮮之際，其後 20 年兩人中斷了聯繫，至 1905 年金滄江出亡清國時才相見。作者試圖透過張謇與金滄江的一段私人情誼，進而審視清韓關係。文中考察兩人的生平、交誼過程與金滄江出亡清國的情景，指出在金滄江待在中國 20 餘年的歲月中，還結交了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政治家，如梁啟超、嚴復等人。除了兩人的私人情誼外，作者還將兩人的交往放在歷史脈絡中，分別就文化認同、士人稟賦、宗藩情結進行探究。因為兩人有相近的文化思想經歷，這些便成為兩人互相傾慕、培養出深厚情誼的要因。在宗藩情結中，金滄江可謂典型的代表。從他的詩文中，幾乎看不到批評清國在朝鮮舉措的字眼。作者認為，金滄江於 1912 年加入中國籍的行動，更可視為以漢為正朔、歸附漢文化思想的行止。儘管如此，金滄江之所以親附中國實因於日本在朝鮮的殖民所致。金滄江以中國為精神避難地，可謂傳統宗藩情結與嚴酷現實雙重作用的結果。

六、結語

有關甲午戰後清韓關係史的研究，經由上述簡單的歸納分析

⁴⁷ 薛平，〈張謇與金滄江——一個世紀前的中朝（韓）友誼個案研究〉（江蘇：揚州大學碩士論文，2001）。

後，可知研究者在相關史料的運用上，中文方面主要採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外交史料》以及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駐韓使館保存檔案」，韓文方面則是《舊韓國外交文書》的〈清案〉與《舊韓國外交關係附屬文書》的〈統署日記〉。固然，研究兩國關係應以兩國為主體，然而當時的國際情勢亦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尤其甲午戰後，清韓兩國都捲入列強的東亞爭奪戰，列強的東亞政策、朝鮮的國際地位，勢必會影響清韓關係的變化。因此參照第三國的檔案紀錄（如，日本、俄國、英國、美國），必將有助於了解清韓關係的全貌。

在此欲透過上述相關研究的回顧，歸納甲午戰後清韓關係的特點。第一，由於甲午戰爭宣告清韓宗藩關係的結束，因此戰後兩國如何建立新關係便成為雙方首要面對的課題。1895-1898年可謂清韓兩國，從舊有宗藩關係邁向建立對等外交關係的過渡期。相關討論除了集中探討唐紹儀在朝鮮活動與角色外，有關1898年清韓國交平行的建立與清廷對韓政策的轉變，可謂近年來討論的重點之一。以往研究皆以唐紹儀為關鍵人物；然而晚近的研究則指出唐紹儀對於傳統關係的維護、相較於光緒皇帝開明的作風與改革，明顯可見光緒皇帝才是促成清韓兩國建立對等外交的關鍵。筆者以為，後者的說法大致不錯，不過細部分析亦可見其中的錯綜複雜。光緒皇帝雖是促成清韓兩國建立對等外交關係的關鍵，但考察其個人的思想與外交作為，亦可見其擺盪於國際公法與傳統思維之間。

第二，清韓兩國於1898年建立起對等外交關係後，雙方通商條約的訂立、邊務問題的解決成為正式建交後急需處理的課題。其中，「間島」問題與邊界的劃分更是兩國交涉的重點。此一交

涉延宕多時，除了雙方的爭執外，日本的介入使問題更趨於複雜。經過多次的協商，清韓兩國於 1909 年簽訂《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正式確立圖們江為清韓界河，結束長久的糾紛。

第三，就甲午戰後清韓關係的開展而言，列強的確是重要的影響關鍵。因此欲瞭解甲午戰後清韓關係的面貌，不可忽略當時的國際情勢。除了介入清韓的建交外，列強的東亞政策更直接牽動此一地區的變化與清韓兩國的命運。甲午戰後清韓兩國的親俄傾向與英日同盟的締結，不僅加深日俄兩國的衝突更造成彼此的戰爭。儘管清韓兩國於日俄戰爭中都宣布中立，卻仍遭受戰火波及，以致兩國交涉受挫。正如權赫秀所言，日俄戰爭不僅使日本成為韓國的主導者，更連帶地阻礙了清韓兩國正常外交關係的往來，致使兩國之間的公使級外交關係不滿 10 年而夭折。⁴⁸

除了兩國外交關係的探討外，兩國的商務關係與文化交流也是值得關注的課題。由於資料收集的不完備，僅以目前所掌握到的部份進行粗略的分析。透過拉森與李廷江的研究，可見日本在成功剷除清國對朝鮮政治外交的優勢後，欲更進一步地破壞清國與朝鮮的經濟關係，企圖壟斷在朝鮮的特殊利益。此外，從張謇與金滄江的交誼、金滄江的個人經歷，亦瞭解兩國關係的另一層面。尤其，對照金滄江的宗藩情結與朝鮮內部高唱反清獨立、「賤清」思想⁴⁹的論調，更可知悉近代朝鮮歷史的變動。

⁴⁸ 權赫秀，〈日俄戰爭對近代中韓關係的影響〉，頁 133。

⁴⁹ 所謂的「賤清」，代表朝鮮對於「尊清意識」的斷絕，具體表現在對中國學問、風俗的批判與全面否定，將清國置於比朝鮮更為低下的地位。參見，月腳達彥，《朝鮮開化思想とナショナリズム—近代朝鮮的形成》（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221-222。

甲午戰後清韓關係研究相關論著目錄

一、專書

- 王明星，《韓國近代外交與中國（1861-191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
- 王如繪，《近代中日關係與朝鮮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 白新良主編、王薇等著，《中朝關係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
- 宋禎煥著、張璉瑰譯，《沙俄侵略朝鮮簡史》，臺北：中華民國韓國史研究學會，1993年11月。
- 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關係嬗變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7年。
- 馬士（Hosea Ballou Morse）、宓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著、姚曾廩等譯，《遠東國際關係史》（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
- 徐萬民，《中韓關係史》（近代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1996年。
- 黃定天，《東北亞國際關係史》，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 楊昭全，《日帝霸占朝鮮始末，1879-1910》，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楊軍、王秋彬著，《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 蔡建，《晚清與大韓帝國的外交關係（1897-1910）》，上海：上

海辭書出版社，2008 年。

崔文衡著、齊藤勇夫訳，《韓国をめぐる列強の角逐－19 世紀末の国際関係》，東京：彩流社，2008 年。

Kim, C. I. Eugene and Kim, Han-Kyo. Korea and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 1876-19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Lensen, George Alexander. Korea and Manchuria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1895-1904. Tokyo: Sophia University, 1966.

Lensen, George Alexander. Balance of Intrigue: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Korea and Manchuria, 1884-1899. Tallahassee: University Presses of Florida, 1982.

Larsen, Kirk W., *Tradition, Treaties, and Trade: Qing Imperialism and Choson Korea, 1850-191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二、論文

(一) 中文

王明星，〈英日同盟與近代朝鮮的歷史命運〉，《煙台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0 卷第 4 期，2007 年 10 月，頁 108-112。

王俊祥，〈論甲午戰後中朝關係演變（1895-1900）〉，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年 6 月。

李恩涵，〈唐紹儀與晚清外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 期，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3 年 5 月，頁 53-126。

苑爽，〈試析甲午戰爭與東亞宗藩體系的解體〉，《河南師範大

- 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3 卷第 6 期，2006 年 11 月，頁 133-136。
- 茅海建，〈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對外觀念的調適〉，《戊戌變法史事考》，北京：三聯書局，2005 年，頁 413-462。
- 孫春日，〈清末中朝日“間島問題”交涉之原委〉，《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12 卷第 4 期，2002 年 12 月，頁 48-58。
- 孫昉，〈晚清中國用條約強化中朝宗藩關係的失敗（1876-1895）〉，《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8 卷第 4 期，2005 年 10 月，頁 461-466。
- 張存武，〈評 George Alexander Lensen 著 Balance of Intrigue: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Korea and Manchuria, 1884-1899〉，《漢學研究》，1：1，1983 年 6 月，頁 326-328。
- 福田忠之，〈對 1896 年《山縣—羅拔諾夫協定》的若干考察〉，收入北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編，《日本學》，第 13 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頁 124-140。
- 薛平，〈張謇與金滄江——一個世紀前的中朝（韓）友誼個案研究〉，揚州大學碩士論文，2001 年 5 月。
- 韓香蘭，〈論清代中朝邊務糾紛與「間島案」問題〉，《洛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29 卷第 1 期，2010 年 2 月，頁 114-118。
- 權赫秀，〈日俄戰爭對近代中韓關係的影響〉，《近代史研究》，第 6 期，2005 年，頁 109-133。
- 權赫秀，〈唐紹儀在近代朝鮮十六年活動考述〉，收入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編，《韓國研究論叢》，第 21 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 年，頁 289-321。

(二) 日韓文

小原晃，〈日清戰爭後の中朝關係－総領事派遣をめぐる一〉，《史潮》，新 37 號，1995 年 9 月，頁 45-59。

李廷江，〈日本財界の朝鮮政策－『日韓通商協會』と『朝鮮協會』を中心に－〉，《アジア研究所紀要》23 号（1996），pp. 59-60。

金東建，〈戊戌変法期における清國の対韓修交決定過程－朝鮮政策をめぐる光緒帝と総理衙門〉，《年報 地域文化研究》，第 11 號，2008 年 3 月，頁 66-89。

岡本隆司，〈韓国の独立と清國の外交－独立と自主のあいだ一〉，收入岡本隆司、川島真編，《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61-180。

李求鎔，〈朝鮮에서의 唐紹儀의 活動과 그役割－清日戰爭前・後期를中心으로－〉，收入《藍史鄭在覺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學論叢》，서울：高麗苑，1984 年，頁 397-430。

李求鎔，〈大韓帝國의 成立과 列強의 反應－稱帝建元 論議를中心으로－〉，《江原史學》，第 1 輯，1985 年，頁 75-98。

權錫奉，〈清日戰爭 이후의 韓清關係研究（1894-1898）〉，收入《清日戰爭을 前後한 韓國과列強》，서울：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84 年，頁 187-233。

(三) 英文

Battistini, Lawrence H., "The Korean Proble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onumenta Nipponica*, Vol.8, No. 1/2, 1952, pp. 47-66.

Kwon, Moo-Soo. "British Policy Towards Korea, 1882-1910.", Boston Spa, Wetherby, West Yorkshire, U.K.: British Library Document

Supply Centre, 1982.

Palais, James B. "Reviewed Work(s): Korea and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 1876-1910. by C. I. Eugene Kim; Kim Han-kyo."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8, No. 4. Aug., 1969, pp. 863-864.

Sigel, Louis T., "Ching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odern Commercial Community: T'ang Shao-yi in Korea."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No. 13, March 1976, pp. 77-106.

Sigel, Louis T., "The Role of Korea in Late Qing Foreign Policy."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No. 21, March 1980, pp. 75-98.

(責任編輯：林益德 校對：黃于庭、劉世珣)

